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罗进德 主编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西方译论研究

刘重德 编著

9-53
9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西方译论研究

刘重德 编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译论研究/刘重德编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1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1055-3

I. 西... II. 刘... III. 翻译理论 研究 西方国家 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493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章婉凝

封面设计/长 乐

印 刷/香河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6.25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1—5000

ISBN 7-5001-1055-3/H·307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总 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目前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中，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

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目前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如果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对外介绍中国和外部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欣喜地看到,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迫切需要、大有用处的知识技能,翻译学作为一门内涵深广的人文学科,在最近二十年的新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学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评论翻译和从事翻译职业的实践,已经成为与对外开放同步前行的社会文化热点之一,持续升温。翻译教学和译学理论研究,其规模之大、阵容之强、水平之高、成果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引起国际翻译学术界的瞩目。中国作者的名字和作品在国际权威译学刊物上频频出现,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的成就。翻译教学已经从语法为纲的语法复制型翻译模式中解放出来,已经分清了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这两个本不应混淆却曾长期混淆的基本概念,大学翻译课不再是外语教学的手段,而是在双语知识基础上培养口笔翻译技能的高级课程。翻译理论研究继文艺学、语言学之后,又有了美学、语篇分析、社会符号学、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等从多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或理论工具,为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开放的,跨学科的人文科学的地位奠定基础。有关翻译的知识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使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翻译及其理论研究不应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应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翻译教学和理论研究领域这些可喜的变化，无疑对造就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提高我国数以十万计的翻译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理论与实践互动，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有两个良好趋势值得注意。一是随着新一代翻译工作者和翻译教师、翻译研究家的迅速成长和翻译学科的壮大(以翻译学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点已有近百个，博士点约有十个)，以及众多翻译学术刊物的出现，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专著的出版，特别是由于译学研究成果的可信和有用，“翻译无理论”和“翻译理论无用”的声音，除了极个别场合外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这当然是个积极的变化。二是译学著述不再是文学翻译家和大学翻译教师的专利，各行各业从事翻译工作的有心人，他们挟着丰厚的实践经验，迈步跨入这个领域，著书立说，带来一阵阵清新气息。这方面以科技翻译界贡献最为突出，其他如外交、贸易、金融、工商企业、编辑出版、对外宣传等各界，也都有作者涌现出来。翻译实务的经验以此得到总结，得以条理化、系统化，为后来人指点门径，同时也为我们的译学建设作了贡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为用，有血有肉、骨肉匀停，这一趋势无疑是健康的，值得欢迎的。

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正是在上述喜人形势之下应运而生，编辑出版的。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成立二十多年来已经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

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奠定了公司在译学书籍出版方面的领先地位。尽心竭力继续为翻译界广大专家、学者、教师、从业人员、学生和人数众多的翻译爱好者提供高质量的专业读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在，在已有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有几点想法：一、加强自主策划，提高原创性，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二、加强实用性和针对性，不仅要反映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新趋势、新成果，更要关注科技、经济、法律、贸易、金融、旅游、传媒等非文学领域的翻译实务；三、笔译与口译兼顾，英译中与中译英兼顾，着重于中英互译和中译英；四、有选择地引进境外著作，港台海外华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不乏佳作，立足中华语言文化，有其独特魅力，是我们的首选。

这些想法能不能实现，能不能把我们贡献精品的愿望变成现实，全靠翻译界广大学者专家、学校师生以及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合作，没有这种支持与合作，我们的想法再好也只是空话而已。我们所期待的支持与合作，既包括惠赐书稿、推荐选题、介绍作者，也包括对我们已出的书发表评论，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将鼓励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是我们无任欢迎的。

丛书主编 罗进德 谨识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立德垂范

——《西方译论研究》序

刘重德先生寄来书稿《西方译论研究》，让我读后作序，盛情之真切着实让我难却，若再推辞，必为虚伪。这是我第二次为长辈的著作作序。第一次是1997年为马祖毅先生的《中国翻译简史》（增订版），说来也巧，这两本书均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刘先生的大名我很早就知道，因为他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著名翻译家，因为读过他的书和文章，当时的印象是他的文风朴实，语言简洁流畅，知识渊博，论理深刻公允。推知文如其人，为人重德。

我第一次见到刘先生是1990年7月17日在江西宁冈县招待所，刘文彬同志请他从长沙来主持英汉比译研讨会。刘先生作了关于翻译研究的报告，之后让我讲了国内英汉语对比研究的状况。这次见面虽然交谈不多，但让我难忘的有三件事，一是他如此平易近人让我没想到。一般说人有了权力，有了钱，或有了学问，大都有些架子。刘先生很有学问，但丝毫没有架子，我的感觉像1980年夏天在青岛第一次见到吕叔湘先生时一样，他们待人都是那么诚恳、亲切、平等，让你一见就敢大胆发问或发表意见。第二件事，为了鼓励青年人开展学术研究，刘先生提出教授的文章不列入评选优秀论文之列，把机会让给年轻人。第三件事就是成立了学会临时组织之后，刘先生让我会后做些准备，给吕叔湘先生写信汇报会议情况，请他出任学会的名誉会长，给赵世开先生写信商讨学会的挂靠单位问题。我于翌年6月23日给吕先生写信，

吕先生三天之后就回了为学会命名的这封信：

自俭同志：

6.23 惠函谨悉。

名誉会长不敢推辞，但希望多几位，我作为其中之一，如王宗炎先生，王还先生都是高年积学，可为学会增光。

又学会名称中“比译”似乎太生，叫起来很不顺口，不如改用“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比较”可以概括翻译，且已有译协，似不必在名称上重复。

草草奉答，顺祝

教安

吕叔湘

1991.6.26

我把此信寄给刘先生，刘先生十分高兴，让我协助他多方联络学界友人参加学会的筹建工作，从此我们通信就多了起来，见面的机会也多了，因此得到教诲的机会也就多了。

刘先生比我长 23 岁，是我的父辈学者，这些年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崇高的品格，他对民族，对国家，对整个人类充满了真挚的爱，你只要认真读他的诗文和学术著作，只要认真观察他的工作态度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你不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认识。他们这一代人有特别突出的三项最重要的追求。一是真的爱国。为了国家可以舍弃一切乃至生命。他们有了贡献不居功，有了荣誉不傲世，受了委屈不喊冤，不消沉。这是人最重要的志向，是为人的根基，这一条出了问题，很难成为高尚的人。我感到我们这代人在这个问题上跟刘先生一代人是有距离的，我只感到他们与我们有别，但对此认识还谈不上很深。二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刘先生做学生勤奋好学,做教师诲人不倦,做翻译一丝不苟,研究学术勇于创新,70岁高龄去各地讲学,到贫困地区培养教师,76岁筹备创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86岁开会以身作则不带夫人。他一生工作热情不减,至今仍笔耕不辍。他那无穷无尽的力量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多么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下一代人三思啊!说到底是他们这一代人比较早地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他们活着不为名、不为利,觉得只有一心为社会、为别人,认真把事情做好,才算没有白活,才算对得起自己,才算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声誉是社会给的,不是自己要来的。他们把权力、金钱、声誉、冤屈都看得极透,他们的心态总是比较平静,没有那么多烦恼,也从不会疯狂发泄,因为他们有中国文化的根底,因为他们懂得什么是历史的必然。三是酷爱学问。刘先生自幼好学,求人教念春联,三年背诵《论语》等8部儒学经典,为完成大学学业,68天徒步跋涉3200里,抵昆明西南联大续学。早期写诗译小说,后来既教学又翻译又研究,所以硕果累累。我翻阅了刘先生的著作,使我惊奇的是他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是70岁以后完成的,比如《翻译漫谈》、《文学翻译十讲》、《爱玛》(重译本)、《癸君子自白》、《汉英四书》(校注)等等。77岁高龄主编近400万字的《英汉翻译例句词典》,从1000余种书、文中精选近5万个例句(段),这是个什么样的工程,我们是可以想见的。刘先生这一代人的不幸是历史浪费了他们的壮丽年华,待历史进入可著书立说的时期,他们都已步入老年。但他们都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们不顾年老,不顾病体,日夜兼程,竭尽全力抓住了短暂的“黄昏”,完成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任务,他们在抢时间,他们在补救所缺的历史。写在这儿使我想起了他们这一代人中许多让人“五脏动摇”的故事。钱钟书先生72岁完成了5卷136万字的巨著《管锥编》。吕叔湘先生75岁完成了对新时期汉语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三本书,一是写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二是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三是主编了《现

代汉语八百词》。季羨林先生 80 岁之后所做的研究、出版的著作更令人震惊,在古代印度语言与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吐火罗语、中外文化交流史、糖史、东方文化、比较文学、文学翻译与研究、散文创作等领域都有重大成果,很多都是国宝或是世界级的。此外他还主持了几个浩大的文化工程,亲任主编或总编纂,除了《东方文化丛书》(500 册)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外,还有《东方文化集成》与《传世藏书》等。周有光先生 90 岁以后不但依然发表文章很多,而且对《世界文字发展史》做了重大修订,还出版了新著《比较文字学初探》。萧乾先生 87 岁与夫人文洁若先生共同翻译了奇书《尤利西斯》。他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代人有些不一样,他们远比我们执着,就是历史不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也是如此。他们把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都投入到他们热爱的事业上了。他们对科学的热忱永不衰减,因为他们完全沉醉其中了。我想,只有对事业一心一意,人格才能升华到高尚的境地,只有忘我,才可称伟大。正像马克斯·韦伯(1864—1920)所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

刘先生的志德高洁让我敬佩,刘先生的治学道路也同样是我的楷模。说到治学,它跟治生与治心密切相关。治生是求生存,治学是求真理,治心是求奉献。从前边的述说我们知道,刘先生较早明白了为生而活,而不是为活而生的治生之道,这是为人之本,也是治学之首本。治学之次本便是治心。治心是治学的目的,是力量和智慧的源头。刘先生在处理治生、治学与治心三者的关系上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及的。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是靠终生修养,但青少年时代必须有这样的追求。刘先生少年时代背诵四书五经,知善良丑恶,辨君子小人,这是成长的根基。

刘先生说:“为人,我一生遵奉的是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论语·雍也》）治学，我坚持学习和思考紧密结合，因为孔子明确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公冶长》）”刘先生总结学术研究指导思想时说：“译论不分古今中西，均应一视同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补其不足，力求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这种学术研究指导思想的渊源究竟是什么，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期，我才发现它主要来自于孔子的中庸之道这一哲学思想体系。”（见本书《前言》）

1. 淡泊名利，乐于助人。刘先生在学界享有盛誉，这方面传为佳话的内容很多。他一生反对沽名钓誉，信奉福楼拜的格言：“荣誉使人失去名声。称衔使人失去尊严。职务使人昏头昏脑。”他总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平常的人。他经常收到全国各地大中小学师生的来信，不管工作多忙，他总是有信必复，解疑难，传方法，甚至自己买磁带寄给学生，指导他们练好发音。天津有一个学生受刘先生通信指导竟达 10 年之久。知识造就人，但也能化成权力腐蚀人。有的人有了些知识，随之也有了些名号，于是便自视上等，开始争夺名位，也便不愿与同类为伍，更瞧不起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这类人的心是自私的，冷酷的，也是悲苦的。拿这些人与刘先生相比，那是多么大的差别啊！我认为，作为一个人最宝贵的也是最难保持的是童心，是天真，因为它还没受世俗社会的污染，真善美在它那儿是真实的，自由平等也是真实的。我很喜欢英国小说家 E. M. 福斯特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借女作家拉维希之口说的一句话：“只有大家都理直气壮地尊重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创造。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给创造准备好条件，来保证创造。什么是平等？平等就是人人相互尊重。这是为学的深层理念，也是人文学科的本质。不管从事什么学科的研究都应追求人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追求这种理念，才能不被世故压倒，才能逐步进入自由王国，才能有智慧，有灵感，有创造力。

2. 博览群书,治学严谨。刘先生读国学,又读外文;上大学师从众多名师将文史哲打通;教学期间既读中国的经史子集,也读外国的语言学和翻译学理论,连机器翻译和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他都写过评论文章。他既创作诗文,又研究学术,既做英译汉,也做汉译英,既研究中国译论,也研究外国译论。说刘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恰如其分的。因工作需要他做过两年多科技翻译,70多岁研究了达尔文学说,翻译了《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刘先生谈到治学时特别强调“要有广阔坚实的基础,要想精通一门,必先博览群书。博览是基础,精通是提高。缺乏基础,哪来提高?没有博览,何来精通?”(见《与大学生谈治学》)刘先生在治学上始终信奉孔子的“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条至理名言。这是科学的精神,也是研究学问的科学态度。所以刘先生说:“它使我终生谦虚谨慎,一向实话实说,深恶那种‘半瓶子醋咣里咣当’信口雌黄哗众取宠之类轻浮学风,从不妄谈自己不懂或知之甚少的问题。”(见本书《前言》)刘先生一贯主张治学要“择善固执,锲而不舍”,反对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更反对抄袭剽窃。他说:“如需引用别人的言论作自己论辩的佐证,无论他是一代宗师,还是无名小卒,其中包括我直接教过的学生,我都一律注明出处,从不掠人之美。”(见本书《前言》)

3. 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刘先生自幼笃信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笃信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因此他研究什么问题都坚守两条:一反对走极端,二反对人云亦云。他研究翻译标准“信达雅”,参考严复与泰特勒的观点,通过批判提出了“信(信于内容)达(达如其分)切(切合风格)”。他研究直译意译,提出了“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意结合,灵活运用。”研究诗歌翻译,他提出“入于诗,出于诗,只见诗,不见人(译者)。”研究风格再现问题,他提出“首先是宏观的文学观点,尽量使译文接近全部原作的神韵风格而达到神似,其次是微观的语言学观点,力求译好

字、句、章而达到形似,神形俱似,方臻上乘。”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提出“没有翻译理论作指导,翻译水平便难以提高。掌握了翻译理论,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当然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偏废哪一方面都不行。翻译既有艺术性,又有科学性,翻译理论是指导翻译实践的科学。”研究“归化”与“异化”,他认为“无论是‘汉化’(归化),还是‘欧化’(保持洋气),都要力求做到恰如其分,适可而止,方成佳译。”研究中外译论的关系问题,他的看法是“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均应予以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补其不足,为我所用,不断补充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闭关自守,敝帚自珍固然是错误的,而照搬洋货,食而不化也同样是不足为训的。”刘先生在《与大学生谈治学》一文中语重心长地对青年人说:“做学问,搞科研,既要继承,又要发展,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雄心壮志。如果只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或者只是比猫画虎,依样画葫芦,何来真知灼见?何来发明创造?学术、科技又怎能发扬光大?一切必将停滞不前,岂不危乎殆哉!”

刘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另一大贡献就是80岁正式创立了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出任会长。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儿就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加以概述。第一方面就是他培育的优良学风与会风。我在2000年厦门第四次研讨会开幕词中总结了五条:①首先要有一个既有奉献精神又能任劳任怨、同心同德、团结合作的领导班子。刘先生反复讲的是学会就是研究学问的团体,常务理事要常理学会之事,做领导一要把学术研究好,二要无私地奉献精力与时间,三要有组织领导能力,善于联络各方学人。②一切为了提高学会的学术水平,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因此要信息公开,学术民主,学术面前,人人平等。③要带出一个潜心学术研究并热爱学会的会员群体。④勤奋好学,学风端正,治学严谨,维护科学的尊严,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沽名钓誉。⑤议题明确,严格

审稿,严明纪律,开好大会,出好论文集。第二方面,刘先生鉴于许多学会的经验教训,带领大家认真学习会章,严格执行会章规定。这一点是很多学会没做到的,面对学界的现状,更感到刘先生的民主思想与民主作风的可贵。其中最要紧的是换届选举的做法:由会员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理事,由理事会无记名投票选举常务理事,其中包括正副会长与秘书长。历史证明,这是优良学风会风继承发扬的组织保证,如果不严格执行这一条,学会很难发展,甚至名存实亡。刘先生在这方面认真实践了“自由就是创造”,“民主就是创造的保证”的伟大思想,为学界树立了榜样。

还有一条令我敬佩的是,刘先生在老一代翻译家中是很早重视翻译理论研究的。他不但研究中国的传统译论,而且很注意研究西方译论。这个文集所收 15 篇(均已发表)论文,其写作时间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近 20 年,说明刘先生从刚一改革开放就开始中外译论研究同时并举,而且投入了较多的时间与精力来研究西方译论,70 岁之后,几乎平均每年发表一篇此类文章,这是很不容易的。从内容上来看也是与时俱进的,1984 年就全面评介了彼得·纽马克对翻译理论与技巧的研究,以后评介了勒曼(W. P. Lehman)对机译的研究,此外还评介了许多译论家关于翻译的理论原则、方法与技巧,特别是关于诗歌翻译的可译性、风格、押韵等格律问题。近两年评介了最新的著作比如让·德利尔(J. Delisle)的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重点评介了实用文体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译者训练的必要性。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重点评介了中西翻译史的比较,介绍了 the Jerome model, the Horace model 和 the Schleiermacher model 三种模式,指出了作者把中文中“文”与“质”译错的三处。再比如评介了哈提姆和梅森(B. Hatim & I. Mason)的《语篇与译者》中的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or: Theory and Practice*,主要评介了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史,介

绍了作者提出的语境制约语言学(context-sensitive 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话语研究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发展,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总之,读刘先生的这本文集,会使你想到,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和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也没做到)一样跟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的进步天天年年在研究新问题或者在做老问题新研究。这种精神与追求也是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人所不及的。

为庆贺刘先生明年 90 寿辰,我送他贺联如下:

著书立说学贯中西叹观止,

为人处世立德垂训称伟功。

杨自俭

2002 年 11 月 18 日

谨识于中国海洋大学

六三居室

前 言

这本《西方译论研究》已有多年好友杨自俭教授作序，为之增光，又有为老朽先后出版过《文学翻译十讲》和《浑金璞玉集》两书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热情支持，实在令人感激不尽，喜出望外，夫复何言？

顷接自俭来函，说他在为拙著写序过程中想到一个问题，兹将原话照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在译协中您是很早重视理论研究的，不但研究我们的传统译论，而且很注意研究西方译论。这个文集跨度近20年，说明您与时俱进，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您应在文集前边写一篇自序或前言，说明这20年的研究历程，会给后生和读者莫大启发。

盛情难却，自当勉为其难，以一个老兵身份向译界青年朋友汇报一下我学术思想的渊源以及在学术研究中遵循的原则。

一个人的人生观（包括为人、处世、治学等等）的塑造，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由他幼年、青年所生存的环境和所受一系列教育的影响所逐步形成的。

我1914年出生于豫北南离黄河70华里的一个偏僻农村，全村一百多户人家，竟连一所初级小学都没有，文化落后，耳目闭塞，识字的寥寥无几，幸而到我该读书识字的年龄，刘、张两姓比较富裕的几户人家合办了一所私塾，聘请邻村牛秀才为教书先生。首